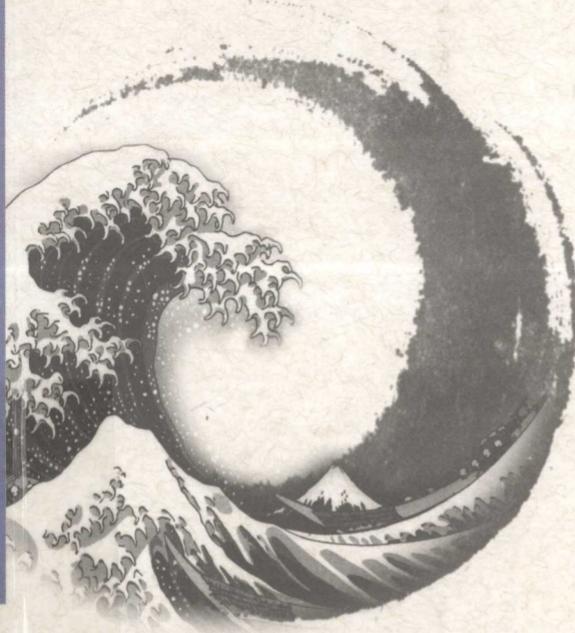


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发生与日本影响

李群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兰芷学人文库



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发生与日本影响

李群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湖南大学出版社图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兰芷学人文库



内 容 简 介

本书针对“文学史”这一近代才出现的新生事物，对其诞生到逐渐形成一种研究范式及其与日本的关系进行梳理后表明：无论是近代中国教育章程的制定、学术分科体系的确立、各门学科教科书的编撰，还是中国文学史观，均受到日本“中介”的西学的影响。中国学者借助日本的渠道学习到西方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进而推动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发生。近代日本在中国文学史观的发生中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发生与日本影响 / 李群著 .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6.4

(兰芷学人文库)

ISBN 978 - 7 - 5667 - 0859 - 5

I. ①近…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近代文学—文学史
—研究 IV. ①I2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1649 号

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发生与日本影响

JINDAI ZHONGGUO WENXUE SHIGUAN DE
FASHENG YU RIBEN YINGXIANG

作 者：李 群 （著）

责任编辑：肖立生 责任印制：陈 燕

印 装：长沙利君漾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32 开 印张：13.25 字数：345 千

版 次：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667 - 0859 - 5/I · 87

定 价：40.00 元

出 版 人：雷 鸣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410082

电 话：0731-88822559(发行部),88821594(编辑室),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0731-88649312(发行部),88822264(总编室)

网 址：<http://www.hnupress.com>

电子邮箱：pressxls@hnu.edu.cn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序 言

王向远^①

李群博士的博士论文《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发生与日本影响》，听说将在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半年多前就希望我作个序。给博士论文作序，是导师的责任和义务之一，我当然答应，但不料竟然拖了半年多，期间李群也催过好几次，说“等您这篇序发来就可以开印了”，但我仍然一次次拖延，没有写出来。要搁在以前，我是从来不欠文债的，凡人家约的稿，宁可提前，从不拖后。但这几年我越来越做不到了。除了自己制定的硬性的写作计划外，横插过来的事情有点多了，有时真不知道该干哪件好。听说老家有一个伯母，家里一旦来了婚丧嫁娶的事情，她便索性躺在床上，用被子从头到脚裹起来，推说头疼或脚疼，等人家把事情做完之后再起床。当年我母亲是把这个当笑话讲给我听的。现在想来，这位伯母也算是“大愚若智”，事情太多了，干脆什么也不干，难怪 94 岁高寿。然而我辈到底是不可效法的。自己该做的，早晚该做。

前几天，《日语学习与研究》编辑部打电话来，提醒我尽快写 2015 年度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述评文章，于是我今天放下其他事情，决定动手准备。首先是把相关专著从网上买回家读。一看学生事前给我查好的 2015 年度日本文学研究论著目录，李群

^① 作者王向远，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会长。

的《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发生与日本影响》已经出版了。于是我赶紧去网上买，各卖家却都显示无货。我发短信给李群，说：“你的书网上不好买啊，能否尽速快递我一本，我正在应邀写上年度的日本文学研究述评，未能作序，也借这个机会评一评你，弥补一下。”李群马上回复说：“书还没印出来，一直等您的序呢！……”

到了这时候，我还能再拖吗？不能了。

李群就是这样。他是湖北人，性情质朴耿直，也是急性子，但是他没有太催我，而是默默地等。致使本该2015年问世的书，拖延到2016年才得降生。看来他对于我，除了理解，似乎还是理解。毕竟，从硕士研究生到博士研究生，他在北师大跟我读书长达六年，彼此相当默契了。那六年间，他是我的好助手，里里外外帮了我不少忙。我说的“里里外外”的“里”，其中包括在我太忙的时候，有时让他帮我去小学把我女儿接回家来，如此之类。在这样的密切接触中，我对李群也有了足够的了解。由于客观的主观的种种原因，他有他的牵累和局限，但也有他的优势；他耿直质朴，有时说话不会拐弯，但与人为善，绝不巧言令色；他本科的基础或许不太好，但他刻苦努力，后来居上；他作为中文专业出身搞中日比较文学，日语基础不牢，但他努力学习，不断进步，终于能够利用中文和日文材料写出了一系列文章，其中包括《近代中国“悲剧”观的引入、形成与日本影响》、《近代“中国文学史”的诞生、写作与日本之关系研究》、《近代复古主义思潮下的中日文学史写作》、《早期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的日本影响因素》、《从整理国故看胡适与日本汉学》等文，并在《文学评论丛刊》、《社会科学辑刊》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这十年来，李群心无旁骛，一心扑在教学与研究中，申请到了教育部项目，又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还在学校的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中，拿到了名列前茅的名次和成绩。对这一切，我为他高兴，也感到欣

慰、满意。

现在，作为李群学术成果的阶段性、标志性成果的博士论文，经过多年的修订和打磨就要出版了。该书写得怎么样，读者会有判断。我想说的是，这个选题及其架构，是我和李群多次讨论才确立下来，选题的难度是大的，学术价值也是大的，整个写作过程是严肃、严谨的。论文写作和答辩得到了东北师范大学孟庆枢教授、清华大学王中忱教授、北京大学于荣胜教授、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张泉研究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邱鸣教授等学者们的一致好评。可以说，李群的这本书以专著的形式填补了学术研究的一处空白。全书从“文学史”这一学术研究的范式与关键词入手，揭示了中日文学、中日学术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有助于读者从一个特殊的侧面了解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具体过程，是一部有着自己特殊视角的近代中日学术关系史、中日比较文学史论著作。从方法论上看，不仅采用比较文学的“传播研究法”、“影响分析法”和“平行贯通法”等研究方法，还运用发生学的方法对近代文学史观与日本的关系进行了溯源性的研究。当然，也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有些问题还可以适当延伸完善。例如，对中国文学展开通史性的研究最早发生在近代欧洲，后转道日本之途进入中国，并由此带上了日本近代学术的烙印。那么，西方、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方式，这两种不同形态的学术资源对早期中国文学史家的影响程度，及其影响产生的差异和效果，就有待进一步阐明。不过，来日方长，相信李群的研究今后还会进一步深化。

因为我这篇迟到的序，而由羊年拖延到猴年才出生的《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发生与日本影响》，会在新的一年给李群带来新的起点。

2016年2月27日于北京

目次

CONTENTS

绪 论	001
第一章 近代中国文学史的诞生及其背景与日本影响	058
第一节 近代中日文学史写作与民族国家想象 /	058
一、“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与中国文学史书写 /	058
二、“文明国度”的憧憬与中国文学史写作 /	062
三、“科学主义”的推崇与中国文学史写作 /	069
第二节 近代复古主义思潮下的中日文学史写作 /	078
一、近代复古思潮的萌发：“西学却自东瀛来” /	078
二、复古思潮的勃兴：近代民族主义（Nationalism） 的出现与日本 /	083
三、复古主义思潮下的“宁馨儿”：早期中国文学史 写作与日本 /	089
第三节 近代日本汉学的变革与中国文学史写作热潮 /	096
一、现代欧洲汉学的发展与“文学史”体例的诞生 /	097
二、近代日本汉学的变革与中国文学史的写作 /	101

三、近代日本“文学”观的嬗变及“中国文学史”书写	110
第四节 近代中日教育制度的变革及“文学史”的诞生	120
一、近代学制的变更、建立与日本影响	120
二、中国文学学科的独立与近代中日文学史写作	126
三、近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与日本影响	139

第二章 近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及其形成与日本影响 150

第一节 近代中国进化文学史观的形成与日本影响	150
一、近代中日两国进化论的引入和传播	150
二、进化论与近代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及文学史写作	158
三、进化论与近代中国学人	164
四、进化史观的形成与中国文学史写作	173
第二节 近代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及其日本影响	194
一、古典文学与传统中国人的地理观、宇宙观	194
二、西方实证史学及地理环境论的引入与明治日本	197
三、日本传入的文明史学和地理环境论与近代中国	208
四、地理环境论与中国文学研究及中国文学史写作	218
第三节 近代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二分法”与日本影响	223
一、二元对立思维与近代中国文学批评	224
二、“写实”、“理想”二概念的引入与近代日本	230
三、“写实”与“理想”二分法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写作	237

第三章 近代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与日本影响	246
第一节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与日本汉学/246	
一、王国维戏曲研究的缘起与日本影响/246	
二、日本文明史学的传入与王国维戏曲史观的确立/250	
三、王国维戏曲研究方法与日本汉学影响/256	
第二节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写作与日本影响/263	
一、《摩罗诗力说》的文学观与日本/264	
二、鲁迅的进化文学史观的形成与日本/273	
三、《中国小说史略》的撰写与日本/280	
第三节 整理国故运动中的胡适与日本汉学/286	
一、“整理”一词的源起与桑原骘藏/286	
二、日本中国学的崛起与整理国故运动的发生/294	
三、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与日本学术/301	
第四节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诞生与日本影响/308	
一、现代批评意识的确立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写作/309	
二、文学史观的形成与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的诞生/314	
三、《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与日本/322	
第五节 近代中国《文学概论》的诞生与日本影响/328	
一、近代“纯文学”观的传入与“文学概论”的出现/329	
二、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与中国/340	
三、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与现代中国“国民性” 讨论/348	

第四章 近代“文学史”写作中其他方面的日本影响	357
第一节 近代中国“悲剧”观的引入、形成与日本影响	357
一、“悲剧”概念的引入与近代日本	357
二、日本的“中介”与王国维悲剧说的提出	362
三、“悲剧”的引入与近代悲剧审美观的建立	369
第二节 近代中国国粹运动与日本影响	374
一、中国国粹运动的兴起与日本	374
二、章太炎国粹观的形成与日本	380
三、章太炎的日本观与其国粹思想	385
结语	394
参考文献	397
后记	413

绪 论

—

西方东侵，近代中国社会出现了剧烈的动荡和变化，有士人惊呼为“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语）。近代中国社会产生急遽变化的动因，除自身内部的调整和变革的内在诉求外，更主要的是在外力的冲击下出现的变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解体起了催化的作用”^①。社会政治领域的动荡变更，使得学术文化、文学思想等领域随之出现相应变化。因而，现今学者多用“西学东渐”、“中西融合”等词汇来描述此期东西方文化、学术及思想领域的交锋、碰撞的情形。中国近代学术的发生，就是在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学术思想相互冲突、交流、会通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而文学史观作为学术研究中的特殊部分，同样是在引入西方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之后，在近代时期出现嬗变和取得重大突破的。文学史观大体包括以下几层意思：一方面指的是文学史家具有的或通过其文学史著述体现出的文学观念、思想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等；另一方面也指文学批评家在文学批评中表现出的文学观念和采用的批评方法等内容。此外，还包括文学创作者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对文学本质和特别属性的认识和看法。当然，本书既然以近代的文学史观为题，则主要限定在“近代”这一特定时间范围内，以前两个方面的内容作为主要考察对象。

^①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85页。

近代以降，西方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进入中国，近代时期的文学史家无论是其研究方法、文学观念还是其研究范围、思想观念、审美标准都出现一些迥别于古代时期的新特征。郭延礼先生曾针对近代时期的文学特征说：“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和终结，又是现代文学的脱胎和先声，尽管它并没有产生足以震惊世界文坛的第一流的作家和作品，但其成就和承前启后的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① 郭先生虽是针对近代文学的特征而言，实际上，近代文学史观同样具有这一“过渡性”特征：既是传统文学史观的终结，又是现代文学史观的开始。近代学人在新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指导下进行的文学研究，必然影响到文学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和审美标准的运用和确定，从而形成既有别于传统又区别于现代的文学研究方法和学术范式。而且，后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很多是在近代时期形成的研究范式下进行的，并一直沿用至今。所以，近代时期形成的许多文学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等，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和示范性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总结那么多，表明近代是一个极为引人瞩目的时代，那么“近代”所指的时间范围和划分标准是什么呢？这不仅是一个时间范畴的界定，更直接关系到本书写作范围与写作对象的确定。学界有关“近代”的界定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书不想过多纠缠于此概念的划分和界定，将近代的上限定在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下限定为 1927 年前后。虽然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和学术思想对中国的影响还只限于器物层面，并没有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内形成普遍的影响，但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西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的同时，也改变了国人“华夷之辨”的思维方式，西学进入中土呈潮水涌入

^① 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卷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37 页。

之势。这种心理结构上的突破、思维方式的变更，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积淀的民族而言，意义极大。梁启超对此有极为形象的概括：

“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沉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①

尘封已久的大门突然打开，屋内的情形开始出现变化。西学对中学的冲击、渗透和影响犹如此情势。因而，如要对近代中国文学史观作发生学的考察，回到事情的原初状态，把时间的起点定在 1840 年的鸦片战争是很自然的事情。将下限的时间确定为 1927 年前后，主要援引陈平原先生的意见：“在我看来，1927 年以后的中国学界，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另一方面，随着舆论一律、党化教育的推行，晚清开创的众声喧哗、思想多元的局面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党派与主义之争，20 世纪中国学术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②当然，时间范围的确定主要是因研究的需要而划分的，有时为了论述个别问题，也可能出现逸出以上时间范围的特殊情况。

捷克学者普实克曾言：“在亚洲文学史中，最引人注目的问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夏晓虹点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94 页。

^②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8 页。

题就是研究现代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产生深远影响的决裂以及探讨这一决裂的原因和意义。”^① 普实克实际上说的是近代文学因其“过渡性”特征而引得诸多学人关注，试图追问其中发生裂变的原因。而对这种决裂原因的解释，学者往往是从自身文化传统和西方学术的刺激中找寻影响因素。毫无疑问，西学东渐，促使中国近代学术转型和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接轨这一因素，非常重要而不可忽视。由此，学界人士从此角度谈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与嬗变的相关著作、文章极为众多。但是，诸多学人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西方文化、学术思想对中国近代文化和学术思想发生影响，是借助日本的“中介”作用进行的，日本在其中充当着“二传手”的角色。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就说：“中国在 1898 至 1910 这 12 年间，思想和体制的转化都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但在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日本在每一步都作为中国的样本和积极参与者，这些成就便无法取得。”^② 当时，西方学术思想输入中国，主要是借道日本翻译或转译西方学者的著述和典籍。梁启超描述当时情形说：“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③ 康有为则在《日本书目志》中形象地说：“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

① 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李燕乔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年，第 112 页。

② 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7 页。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 年，第 71 页。

食。”^① 可以想见，当时中国借道日本翻译西书之事业的红火程度。王闿运在光绪二十九年（约 1903 年）就认为时人所习“名为西学，实倭学也”^②。葛兆光先生以为“这话当反过来说，当时看上去虽然满眼都是倭学，其实都只是转手从日本贩来的西学”^③。二人论述的角度虽不同，但实际上说的是一个事实，西学在晚清时期是经日本的“中介”作用进入中国，并带上了日本本土学术的痕迹。季羡林先生就指出：“清朝末年，中国学人大量涌入日本，学习各种各样的技术学问，大多数是日本向西方学习的产物。这些技术学问中不可避免地会掺杂上日本本土的东西。”^④ 因此，如果我们忽视了近代日本的“中介”作用，就难于对近代中国学术转型以及近代文学史观的发生，做出客观历史的描述和公允的评价，也就无法全面地揭示 20 世纪初叶处于学术转型中的中国对西方学术的借鉴与吸纳的历史全貌。

明治维新以降，日本有关中国学问的研究经历了由传统“汉学”到“中国学”的“蜕变”过程。这一转变过程是在传入日本的西方 Sinology（汉学）、日本自身传统汉学基础与中国学界的参与，三者的共同作用下发生和进行并最终完成的。

近代欧洲汉学的诞生与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兴起的科学思潮密切相关。科学思潮激发启蒙思想家大胆批判，敢于怀疑的精神，对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一定意义上，

①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自序》，《康有为全集》（3），姜义华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585 页。

② 王代功：《清王湘绮先生闿运年谱》，《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六辑，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 年，第 235 页。

③ 葛兆光：《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选自《西湖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40 页。

④ 季羡林：《20 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序一》，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7 页。

近代西方 Sinology（汉学）是在近代西方科学思潮的推动下，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共同孕育出的一门学术研究。欧洲 Sinology 的诞生与现代西方理性意识的觉醒和科学精神的张扬密切相关，但同样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为冲破中世纪神学的堡垒，建立现代文明社会的需求息息相关。欧洲启蒙思想家为打破或对抗中世纪宗教神学对人性的禁锢和压抑，将中国文化以一种极富理性精神的材料积极引入西方社会。不仅解决了西方社会急需了解中国文化的态势，同时，也促使了中国文化在欧洲的广泛传播。虽然说早期西方 Sinology 的诞生离不开利玛窦、杜赫德等人的巨大功劳，但笛卡儿、莱布尼茨、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黑格尔、康德等欧洲巨匠的加入，促使西方 Sinology 走到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发展轨道中来。他们为西方 Sinology 的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的同时，也推动了西方汉学研究逐步走向兴盛和繁荣。由于地理和历史文化原因，早期西方学者极少有亲临中国本土的，他们最初对中国的了解大多建立在主观臆测和想象的基础上，严重匮乏第一手有关中国的资料。尽管他们也极为关注中国文化，但由于资料的匮乏，西方人对中国文化还处于一知半解或迷信乃至崇拜的境况。近代文艺复兴后，加上后来的地理大发现，西方人了解中国渠道增多，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开始逐渐走向理性和成熟。孟德斯鸠从中国“礼”的虚伪性认识出发，展开对中国国民性的批评；卢梭在《科学与艺术论》中提出“中国文明否定论”；亚当·斯密提出“中国发展停滞论”，等等。西方人不再把中国文化作为顶礼膜拜的对象，而是作为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一个可以依据材料和科学方法加以批评和否定的科学研究对象。随之，西方 Sinology（汉学）也逐渐发展为一门科学的且极富理性主义色彩的学科。

近代欧洲 Sinology 的繁盛，还与 19 世纪科学实证史学的诞生有着密切关系。法国哲学家孔德将实证哲学和历史研究结合起

来，同时引入自然科学方法，对 20 世纪西方史学研究产生广泛影响。英国史学家巴克尔（Buckler）（或译为博克尔），是真正将实证主义引入历史研究领域的。他引入自然科学方法等对发现的历史资料进行处理，运用归纳、推理和演绎的方法，从材料中探寻史实规律，这对后世的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证史学的诞生，是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主动结合，它对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和文学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实证史学把人类一切文化作为研究对象，而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采用历史研究方法对其展开通史性质的研究，探寻不同时期或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历史联系性和其中的历史规律，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文学研究者从实证史学的此一思想中获益极大，他们采用“史”的结构框架对本国文学或者本区域文学，展开通史性研究，这一理念可谓对“文学史”体例的诞生起到了直接性的刺激作用。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施行文明开化政策。日本为早日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主动以西方现代社会为发展典范，在社会生产领域以及学术思想和文化等诸多领域，均以摄取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思想和学术文化为能事。近代日本积极引入西方汉学，有力推动了本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近代日本汉学无论是学术研究方法和研究观念，还是研究对象和研究视野均带上了浓厚的西方汉学的色彩，在推进日本汉学转型进程的同时，也为日本中国学在近代时期出现繁盛景象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近代日本引入西方汉学的途径之一是邀请西方汉学家到日本讲学。1886 年，德国 V. 兰克（Leopold Von Ranke）学派的代表性学者人物 L. 里斯受邀进入日本东京大学，里斯的到来可谓是翻开了日本汉学研究史上新的一页，积极推动了日本史学实现近代化革新和转型。日本学习西方 Sinology 的另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派遣学生前往欧洲留学。近代日本许多著名的汉学家都有赴